

《中美日报·集纳》 与上海孤岛时期的文艺抗战

郭 刚

内容提要 《中美日报》是上海孤岛时期隶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份党报，其文艺副刊《集纳》为孤岛上海存期最长、版面最稳定、战斗姿态最激进和读者反响最大的副刊之一。《集纳》一方面通过刊载反映孤岛现实和抗敌战况的新闻文艺进行正面宣传，一方面通过针砭敌伪的杂文灌输民族意识并进行舆论争夺；此外，该副刊亦通过各种征文、特刊和“集纳笔会”等组织形式对孤岛文艺青年进行政治动员，是国民政府孤岛文艺抗战的发动机，在抗战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中美日报；集纳；张若谷；孤岛

抗战胜利后，面对喜悲交加的“惨胜”局面，亲历孤岛苦斗的孔另境在追忆战友王任叔时谈到：“在国军西撤，日敌尚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二三年间，在上海租界里展开了一幅最尖锐的敌我半公开战斗。一面是日阀和汉奸，一面是我国的各党派地下工作者。”^[1]此处特别提及的“各党派地下工作者”，意为为战斗于孤岛的国民党系统人员正名，同时表达对战后国民政府对各类抗战功勋嘉奖的不满。原因不言自明，国民政府的嘉奖一般是排除“异党”的^[2]，这是孔另境的言下之意。另一方面，在当下大陆学界，对孤岛文学的论述一般围绕中国共产党或被认可的中间力量，避谈国民政府的抗战史迹，以至我们无法得出国共两党“共赴国难”的基本判断。究其原因，正如陈青生指出的那样，海峡两岸受制于“革命斗争”和“反共斗争”对立理念，缺乏“国家主体理念”^[3]。当然，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除意识形态原因外亦有历史原因。战后国民党方面迫于迅速恶化的政治局面，无暇叙述；更直接的原因是国民党不少留沪人员甚至是关键人员的附逆，致使一些对孤岛抗战极为重要的人物难入正史。大陆同样如此，非左翼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发动的抗战文艺多被悬置，如《中美日报》《正言报》等文艺副刊就无人关注。鉴于此，本文希望借“后来居上，终执孤岛报坛之牛耳”^[4]的《中美日报》来一窥孤

岛文艺抗战，尤其希望通过考察这份持续时间最长、编辑最为稳定、战斗姿态最为激进的文艺副刊《集纳》来探讨国民政府的文艺动员与组织，以期还原孤岛文艺抗战的另一面。

一 “抢救人心”与《集纳》的编辑方针

《中美日报》于孤岛“洋旗报”抗日声浪最炽之时的1938年11月1日创刊，结束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发行约在2—3万份，最高时达12.6万份，属党报性质，由美籍人士施德高（H. M. Stuckgold）担任发行，受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沪专员冯有真节制。在创刊前，外人担任发行而由国人编辑的报纸有《每日译报》《文汇报》《大美晚报》《大晚报》《华美晚报》《华美晨报》《大英夜报》等十多家，它们虽接受冯有真的业务指导和资金支持^[5]，但因各报组成人员复杂，立场各异，在贯彻国民政府宣传意图方面分歧不断。如《每日译报》主编钱纳水便无法节制王任叔、梅益等左翼报人，曾导致报纸社论空白^[6]，洋商报之间也不时因报道的倾向性问题相互辩驳^[7]，《申报》《新闻报》也因过度重视商业经营让冯有真头疼。于是国民党方面“感觉到当时上海的洋商报纸，都还不够真正代表本党的立场，传达中央的意旨，因而决心创办一

张代表党的立场的报纸，秉持中央的指示，执行宣传战与思想战的前哨任务”^[8]。当然对上海这个国际性都市而言，四百万以上人口及由此带来的财富膨胀、远胜内地的工业基础、发达的金融汇兑、庞大的进出口吞吐、远东舆论中心和国际情报集散地的地位，随时都可能导致资敌行为的发生，进而影响抗战大局。事实上从“八一三”沪战开始不久，上海周边的伪政权便产生。汪系“和平之声”鼓噪上海后，附逆之势蔓延，悲观失望与立场摇摆极大动摇了国民党原有政治基础。正如《集纳》编者张若谷所言：“本报同人在创办的当初，就以抢救上海人心为第一件大任务。”^[9]在《中美日报》两周年纪念册中，“抢救人心论”被再次强调：“上海目前所缺乏者，是一张站在正义立场，发表公正言论，报道确实消息的大型日报，使颓唐的心理，麻木的神经，振作起来，复活起来，并使叛逆之徒有所畏惧于舆论的挞伐。”^[10]

更直接地说，“抢救人心”是为了维系孤岛市民与重庆国民党中央的精神联系，故刊载的也多是来自国民党立场出发的各种内外战讯、国府政策、对外交涉、要员演讲谈话的报道和阐释，新闻来源一般取自重庆的中央社和中央社上海分社，国际新闻取自美联社、路透社等亲华媒体。要闻和地方新闻注重刊载社会各界对抗战和领袖的拥护，尤其在揭露投降卖国上不遗余力。社论方面，除詹文浒、钱纳水、查修、李秋生、倪文宙等撰写外，多由胡朴安和徐蔚南主持的党报社论委员会即正论社包办^[11]。此外，教育版先后由教育部驻沪办事处钱弗公、丁立人负责，除大量刊登教育部通报、法令及内地教育新闻外，教育随笔栏目多揭发文教界落水分子及与日伪勾结的学校，同时报道立场坚定的教育机构，俨然孤岛青年学生择校指南。此外，范泉编辑的《堡垒》侧重思想性，虽然介绍苏俄方面颇为用力，但詹文浒的理论文章则针对性颇强，意图对影响甚大的阶级论等“异党”宣传进行“纠偏”。鲁思编辑的《电影与戏剧》和后继的《艺林》，密切关注孤岛戏剧运动和电影动态，对于影响较大的作品都有特辑和专辑评论，具文学史和艺术史价值。因之，《中美日报》的各个版面在抗战大局面前，态度统一，相互配合，宣传作用明显。当然，此时

居于法理正统的国民党立场也代表了民族国家立场，故在贯彻其政治意图的同时亦起到稳定民心、震慑附逆、团结对敌的文宣效果。正因此，汪伪诅咒道：《中美日报》“一日不除，终为和平大业完成之累”^[12]。国民政府则褒扬其“由于立场的纯正，使他们的言论和新闻报道，引起孤岛同胞乃至友邦人士的重视，并使他们在无形中取得孤岛新闻界的领导地位，成为本党在沪宣传的两大坚强堡垒”^[13]之一。

自《中美日报》创刊，《集纳》便作为文艺副刊出现，编者为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成员，有着天主教信仰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会员身份的张若谷。《集纳》每期约占半个版面，除该报被租界工部局三次停刊的七周49天^[14]，1939年2月农历春节停刊三天，1941年1月24—29日农历春节停刊六天，1941年9月因不明原因停刊两天外，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12月8日，共出1038期，其间仅1941年7月和8月短暂变更为每周一、四、日发刊，此外并不间断，这也是孤岛时期仅次于《大晚报》《申报》《新闻报》文艺副刊而存期最长，影响最大的文艺副刊之一。尤其在1939年5月后，《文汇报》《每日译报》《大美报》被叫停，《华美晚报》《华美晨报》等经营衰落，《集纳》几乎成为孤岛各大报纸中唯一保持激进战斗姿态的文艺副刊，故考察《集纳》，几等同于考察国民政府在孤岛上海的战时文艺。

在开始《集纳》的讨论前，有必要简述国民政府对沪上各报副刊的态度。1937年3月，邵力子召集新闻界座谈会，主张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须打破“有闻必录”的信条，“对副刊之选材，亦应于言论之撰述，新闻之记录，加以同样之注意”^[15]。这表明，当局在战前已经对新闻界进行了初步的政治动员。抗战军兴，中宣部再次给沪上各报以快邮代电方式发布指导文字一篇，令上海各报纸副刊须按照指导行事：

为了要应付目前伟大的时代，旧有的副刊的内容自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副刊的本身便须有一番急切的改革。至于其改革的步骤，消极的约为：

(一) 肃清一切颓废，淫靡，虚矫，厚夸，以及各种不切实的作品。

(二) 绝对避免那般空洞无物, 意识不正确的文字刊载。

积极的则为:

(一) 采集中外英勇卫国的事实, 鼓舞全国人民造成一种乐观进取的健全心理。

(二) 应尽量刊载民族英雄之悲壮史迹。介绍全世界各国求民族独立解放之伟大文艺运动。

(三) 文字力求诚恳简洁, 避免俗套类于空疏口号式的宣传。

(四) 对于有功勋的前方将士, 应极力介绍刊载, 以便强调前方抗战之士气。

(五) 对于救护, 防空, 交通等知识, 应极力以通俗的文字, 尽量刊载介绍, 使民众有充分的准备。

(六) 对于侵占区的民众, 应负教导鼓舞其奋起为民族抗战坚强的后备为原则。^[16]

由此表明包括副刊在内的新闻纸面对大时代必须做出调整, 即拥护国策和为抗战服务是总的编辑原则。对此, 编者张若谷认识更为透彻:

文艺副刊最能代表一家报社的风格, 他是站在报纸的前哨第一线去争取读者。因此他的使命和责任也最重大, 凡是一张能够时时刻刻表现出战斗矫健姿态的文艺副刊, 没有不受读者热烈欢迎的。^[17]

基于副刊不输正刊的认识和为服务抗战的自觉, 张若谷需要让《集纳》担负起报道和教育的双重使命。正如张氏在《发刊词》中所说, 《集纳》“不单是一块公开的文艺园地, 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公器’”, “我们所负的使命, 是‘报’与‘导’并重”^[18], 为的是对上海四百万市民“启发思想, 认识时代, 锻炼意志, 培养正气”^[19]。为达效果, 他甘于冒着被工部局停刊的风险, 以“激进”姿态大量刊载了国府要人演讲, 各种战地报告及抗敌史迹、国民精神总动员令、新生活运动等文字, 同时批驳投降言论、“和平”谬论, 以期达到警醒孤岛民众的目的。

在具体编辑理念上, 张若谷同时追求“大众化”与“杂志化”。大众化即主张“新闻与艺术的合流”, 这是在战时动员体制下将新闻文艺化, 具体表现就是大力刊载新闻特写、人物采访、战区情报、新闻

小说和报告文学。“杂志化”即为了达到“启发思想, 认识时代, 锻炼意志, 培养正气”的目的, 加强文化普及和引导, 表现在内容上即刊载各类通俗化的学术讲座。此外, 出于对战斗性的重视, 张氏大力倡导杂文, 但特别注重内容的浅显和直接的指摘, 这一点与柯灵编辑《文汇报·世纪风》时的“鲁迅风”式杂文迥异。

二 《集纳》的“三次蜕变”

1941年2月12日, 也即《集纳》发刊两年多后, 张若谷总结了其发展历程: “从创刊到现在, 经过三次蜕变, 从专门化而通俗化而斗争化; 从学术性的副刊, 改为文艺与杂文的交流, 再进而为报道现实的杂文综合。”^[20]

此处的第一次蜕变大致是指从创刊到1939年11月前后, 该时期一大特点即他所言的专门化和学术性。事实确也如此, 创刊伊始, 张若谷邀集留沪报人学者7人每周撰写连载的文化讲座, 包括周日上海商学院教授朱海万的《日曜艺话》、周一张若谷本人的《月曜史话》、周二作家徐訏的《火曜剧话》、周三持志学院教授胡道静的《水曜报话》、周四上海法学院教授吴山青的《集藏漫谈》、周五邵洵美的《金曜诗话》、周六徐泽人的《中国工艺美术漫谈》。《日曜艺话》和《月曜史话》刊完后, 接续的是留法归国的三吴大学新闻系教授洪洁求的《现代法国文学漫谈》, 与此时段稿件性质类似的还有邵年(邵洵美)的《在中国的外国人》系列文章10篇。

虽然张氏在总结中突出了专门化和学术化, 但在《集纳》的第一年中, 通俗化或大众化实在也是编者的追求。他特别强调“新闻文艺”, 认为“从事于新闻事业的文化人, 如经过若干时间训练之后, 等到习惯成了自然, 他的工作成绩有时反能超出一般文学作家之上”。进而指出“一个新闻记者同时也就是一个文学作家, 他像其他的文学家一样, 也可以做一个出色的诗人, 批评家, 或小说家”^[21]。此说虽有意区别左翼倡导的报告文学, 但亦有现实考虑。此时的供稿群体多数已从当初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这一运动中抽身而出, 相率进入报界, 如张若谷本人进入《时报》、朱应鹏进入《神州日报》、

汪偶然进入《大晚报》、徐蔚南组建了正论社。故而只有提倡“新闻记者与艺术家的合流”，才能有效集中滞留孤岛的同道开展文艺运动。

对于“新闻文艺”，张若谷不仅组织了若干篇文章的讨论，还尝试了理论建设。他认为新闻文艺并非纯文艺，而是带有写实主义的特征，“若能把典型的环境改成为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人物”，“对读者展示出某件事实的真相，提示对于事件的正确的意见，这样的作品，就形成了新闻文艺的作品了”^[22]。质言之，他所要求的新闻文艺实际是对一个新闻事件进行艺术加工，使之具有典型意义，且因事件地点的具体性而让读者产生“对号入座”的联想。张氏曾以1939年10月发生在威海卫路中礼堂日伪大民会宣传科长在婚礼现场突遭枪击的大血案为例暗示以“锄奸”“暗杀”“绑架”为内容的新闻更符合新闻文艺对素材的要求，这无疑是在要求新闻文艺要密切配合孤岛的斗争实践。

由于张若谷的大力提倡，新闻小说很快出现在《集纳》中，如悲悍的《入狱》、野吟的《吉田与芳子》、邵宗兴的《徐家桥畔》、罗斌的《土肥原走访吴佩孚》、何仙的《张伯元的死》和《海上的火花》、木言的《良民证》和《五颗头颅》、丁炎的《龙兴茶园》、铁牛的《坏了五个车胎》、华的《一个日奸》等。但此时段的新闻小说，其明显的虚构特色也招致了读者的不满，故到1939年7月后渐渐沉寂。1941年2月，张若谷再次提倡并在当年3月9日刊发专辑，由此引发了对新闻小说更为严肃的检讨。不过若将时空切换到彼时的上海租界，孤岛市民未尝不能体会这类作品中的腥风血雨。新闻小说到1941年3月底基本消失，原因在张若谷的一则启示中说得比较清楚：

最近承读者们寄来许多篇的新闻小说，都是以最近孤岛上发生的集团暗杀及集团绑架案件作题材的，我们为了尊重工部局警务处善意的谕告，只好不得不都割爱了。又关于揭发侵略者惨酷的暴行，或暴露厌战心理者，也在禁止刊载之例，以致有许多绝好的现成的事实，不能采作为新闻小说或报告文学的题材了……^[23]

似乎是因题材的敏感导致新闻小说的被禁，但实际上张氏的处理方式是让“新闻小说”成代罪羔羊，

而“题材”问题依旧，这清晰体现在其后栏目名称的不断变换中。

《集纳》的第二次“蜕变”张若谷有如下描述：

“第二年的集纳，则是专门化变成成为通俗化，除了保持原有一部分的短篇文艺创作及介绍外，并多刊于暴露社会现实生活的杂文，同时也注意到青年学术修养指导方面，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文艺与杂感的汇流阶段……”^[24]

这里所说的“通俗化”，虽然包括了新闻文艺，如报告文学、通讯、人物特写等，但范围扩大，既有1939年8月就已连载的《民族故事》，还有新创栏目《战区情报》和《忠义列传》。张氏在1939年岁末《集纳》调整版面时预告：“添增《战区情报》，包括前线，后方，游击区的通讯特写，记述中国将士的英勇事实，及人民为国效劳的真相。《忠义列传》，收录七七事变来，为国捐躯，各将领士卒的行状事迹，编成小传，供他日作战中之资料。”^[25]在《战区情报》栏目中，沙羽^[26]是最用力者，先后贡献20多篇特写。沙羽的文字不乏动人之处，也洋溢着乐观的战斗情绪，部分人物甚至可以和“差半车麦秸”这样的典型相比，不足之处是说教过多，这也是此类《战地情报》的通病。

区别于《战区情报》的纪实性和文学化描写，《忠义列传》则带有“史笔”特色。如《高鹏》^[27]中第一段使用了“迄未稍动”“坚支四日”“裹伤挥众”“反复肉搏”，字里行间透出“惊天地而泣鬼神”之感，收束时归结到“模范军人”和“民族英雄”则烘托时代氛围。此类列传中殉国军人多被追授将官，但亦有少数不见史传者，如《牛陞廷》^[28]可补史料阙如。上述两个栏目大约刊载至1940年中停止，而从1939年9月开始刊发至当年12月的《民族故事》则可以和《忠义列传》参照来看，一个摹古而突出气节；一个状今而表彰忠勇。前者题材多取自南宋和明末，抗击倭寇和抵抗入侵是其主题，风格上一如后者的哀而不伤沉郁悲凉，如《血印和尚》《左光斗与史可法》《歼灭倭寇的曹顶》等。关于《民族故事》栏目的设置，张若谷也有如下表示，栏目之目的在“记述中国历代民族捍御外侮可歌可泣之史迹：如忠臣遗民英雄义士之逸乘及贰臣奸邪巨魁之劣迹，凡足以针砭现状，激励仇忤者”^[29]。提倡气节与忠勇，

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核心内涵，对于身处孤岛的报人来说，更有“抢救人心”的重要作用。但同时，针砭和挞伐丑恶是一种更直接痛快的手段，这个功能主要是由杂文来承担的。

《集纳》在将满一年时，刊发了华西擎的《讽刺杂文》。作者小心澄清了抗战时期的杂文写作并非“无聊的浪费”：

这种讽刺的杂文只能配合着那些已消逝了的可诅咒的时代而存在，针砭那些时代是适宜的。可是，随着抗战的展开，一切都是跨入了进步，于是，这个时代是再不需要针砭了。这些话，当然，部分是属于对的，不过，这些话已是患上了笼统的武断病。诚然，抗战是使着一切改进了质和量，但是，伏在黑陋角落的罪恶的滋长，仍然不容我们予以忽视的。因此，一面我们固然得尽情歌颂这伟大的时代，但是，对于那些为整个抗战所不容的丑恶卑劣的事物，无疑地是要进行讽刺工作的。^[30]

华西擎此文观点，颇似延安时期丁玲和周扬关于“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分歧的先声，但实应看做是1938年末孤岛“鲁迅风”论战的回响。虽无证据表明《中美日报》卷入了那场论战，但此刻重提杂文却延续了论战中阿英、杨晋豪、庞朴的观点，即认为从大众化的需要出发，“鲁迅风”杂文曲折晦涩的表达方式，甚至大段引用古文的“掉书袋”作风并不适合抗战新形势，针对的是蹈袭鲁迅30年代杂文的王任叔、周黎庵、文载道、周木斋等。客观地说，“鲁迅风”论战中阿英的观点和代表国民党孤岛文宣系统的理论家杨晋豪^[31]的批评是中肯的，态度也是友善的，且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要求。此处华西擎的文章虽未提及直接、明快的写作准则，但清楚提示了杂文应有的批判指向，即对抗战阵营进行歌颂，反之才是批判暴露。

《讽刺杂文》刊发不久，老张的《杂文的社会价值》也在《集纳》刊发。从行文看，老张即张若谷本人。文章称：“杂文犹如响锣，你得高高地敲着响锣，去鞭策激励千万的人。特别对于这孤岛上一班麻木不仁的一群，敲得越响越好；越响越能显示出杂文的社会价值来。”^[32]此处所强调的，即需要运用杂文的批判功能刺激教育孤岛市民，这也是

对华西擎观点的补充。由于张若谷的党报副刊编辑身份，文章自然可视为国民党对孤岛杂文写作的建议甚至指导。而他的杂文观念，与国民党文宣系统对鲁迅杂文的认识也有着高度一致性。张若谷1931年在评论鲁迅的《华盖集》时感慨：“在我们的中国，不知道要等到几时才可以发现着赞美时代的作家呢？”^[33]这对“赞美时代的作家”的呼唤表明其有着迥异于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政治态度，即张若谷并非鲁迅式的反抗者，而是典型的合作者。无论从其早期与朱应鹏、徐蔚南、傅彦长等倡导“民族主义文艺”，还是赴南京参加《革命军日报》的编辑，都显现出张氏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态度，且并非出于政治投机，而是一种政治选择。张若谷在1932年一·二八战事期间担任《大晚报》战地记者，深入火线采访的经历可以突出体现其民族情感和责任担当。张若谷对鲁迅杂文即使有肯定性评价，也仅是艺术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他在《集纳》中对杂文的要求，根本还是看其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政治态度，即“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政治态度之外，还要回到“鲁迅风”论战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字的表达方式。国民党中宣部曾对副刊的取稿做了“文字力求诚恳简洁”^[34]的要求，而张若谷亦有相似表达：“我在执笔时，常牢记着我的文字是写给报纸的一般读者看的，所以文字力求通俗浅显，常用轻快亲切的笔调，尤其从不敢忘记新闻记者对于社会对于民众所负的职责，这样我的作品在形式方面虽然不讲求怎样的精炼，而在内容题材方面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大众的读者。”^[35]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欧阳棣的《谈绕笔头》，作者声明反对“咬文嚼字”和“弯弯曲曲”的文章，主张“平铺直叙”“富有情致”的文字，其所指不言自明^[36]。由上可知，从政治态度到语言文字，张若谷对杂文的认识与国民党战时文宣要求是相互配合的，也就是说，张若谷提倡的杂文，与“鲁迅风”杂文完全不同，笔调的明快直接，政治态度的拥护大局，一致对敌是基本要求。基于此，《集纳》中刊发的杂文，绝难发现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指摘，也不像王任叔等所不断强调的“内部斗争”，更没有对抗战局势的所谓“妄议”，主流是对孤岛上日伪、汉奸、落水者、麻木的沉迷享乐的市民、利欲熏心的奸商、

缺乏战斗精神的色情文艺作家、消磨抗战意识的书商编辑等的攻击揭露。

其实从《集纳》创刊，杂文就开始出现，只是数量少且持论相对保守，不故作惊人之谈，自我流露克制，少传统落拓文人的猖狂之气，表达上更讲求简洁质直，颇有胡适“浅薄”之风，故在孤岛文艺副刊中并不炫目，或完全一副中规中矩的党报面目。但若细读其中作品，则不乏富有建设性的灼见。如海万的《救国工作》一文针对统一战线内部对于领导权问题，强调在救国过程中每个人尽自己本分的工作，不必存救国非我莫属的争功之念。复生的《政治道德的进步》一文，针对政见不同而引起的对政府的非难，主张在“国家至上”的层面摒弃异见，求同存异，这才是国民应有的“政治的道德”。联系到此文写作时武汉失陷不久，很容易联想到战前《新华日报》建言“死守武汉”的激进举措及苦守不成后易造成的悲观情绪，这种有碍民众正确看待“失利”的认识是国民党文宣系统亟待纠正的，文章虽然使用了“政治道德”这一带有刺激性的术语，但却并不过分批判，而是强调了在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形成的团结局面，透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当然，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对抗战阵营内部也会偶有暗讽规劝，如欧阳棣《谈笔头》《论写稿》《讽刺的种种》，海云《精诚团结》，子车《定于—的言论》等等。此类杂文千字上下，态度严正恳切是其特点。

杂文地位的上升，只是在《集纳》的第一年行将结束之际，张若谷革新副刊，特意将“讽刺小品”作为刊载的重点。这部分杂文评论范围极广，举凡各种孤岛丑态，无所不包。此种攻击性杂文始终处于版面的突出位置，是《集纳》战斗精神的突出表现。但是到了1940年8月后，受租界当局新闻检查影响，版面突出了雕版木刻的“文艺”二字，字号较之“集纳”二字稍小，文艺栏下容纳了诗歌、短篇小说、译作和散文，同时直接攻击性的杂文大幅减少，歌颂性的文艺作品明显增多并成为主流，这似乎也正是张氏所归纳的“文艺和杂感的汇流阶段”。此阶段杂文锋芒虽有收敛，内容也倾向于社会、民生方面，如米煤涨价、罢工、教育、青年赴内地等社会问题，但不时也有与日伪针锋相对的斗争及针对同胞的思想教育，努

力保持着一贯的战斗精神。诚如张氏所言“要谅解维持治安及公众秩序的当局者不得已的苦衷，我们不得不压制一些正义感的愤怒，而以另一种的方式，发挥一般正义人士们嫉恶如仇的大无畏精神”^[37]。

1940年10月底，《集纳》版面作了较大调整，一是创刊了《文艺》周刊，二是增加《笔谈》。编者表示：“集纳文艺是一种配合战时的纯文艺周刊，星期日发刊，内容专载有充分现实性和斗争性的短篇创作，或翻译，表现御侮建国的木刻和漫画。”^[38]从1940年11月3日首次刊发至1941年6月15日为止，《集纳文艺》共刊发32期。^[39]《集纳文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新闻小说的提倡，报告文学、新闻特写、散文、诗歌和译作均有刊登，还有《上海街头诗特辑》《街头诗理论专辑》《悼画家张善子先生》《新闻小说特辑》《诗歌特辑》等。

《集纳笔谈》则是1941年元旦发起的集纳笔会的会刊，“宗旨完全是联系集纳作者读者与编者间的感情”，对会友的额外要求是每月至少一次将稿费部分充作“良心献金”，“表现上海文化界对于襄助祖国建设事业应尽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义务”^[40]。笔会初征会员百人，经15日的接受申请，除137名预备会员外，正式会员竟达到134人，可见踊跃。彼时孤岛成规模公开活动并不现实，故明确“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工作，只能联络同文感情，发刊《集纳笔谈》互做写作上的切磋和研究”，“我们先从读书和写作这二方面下手”^[41]。笔谈每月5日、20日发刊，内容以指导青年写作和阅读为主，先后刊发了茅盾、戴季陶、叶灵凤、王平陵、冯味因、孟湘柱等人的读书写作经验，张若谷也译介了莫洛亚、托尔斯泰的写作经验谈。此外也举行了小型的职业界和学生界会员座谈会，除思想写作训练外，还筹办了图书流通部，提供借阅服务。《集纳笔谈》出至1941年6月20日，前后共出11期，后因版面压缩停刊。

除上述革新外，《集纳》第三年中值得重视的栏目是从1941年元旦开始每日连载的《正气楼随笔》。作者摘奸使用文言笔记体或史传体品评臧否战时的人、事，尤以追悼褒扬守节不阿的爱国知识分子，抨击失节附逆奸人为主。从文体上看，这部分文章应归为一般意义上的杂俎，而考其内容，摘

奸为张若谷无疑^[42]。这是目前发现的张若谷仅有的文言写作，其臧否人物的犀利程度不亚于白话体杂文。张氏长于人物特写，叙述详略得当，品评峻切，在其写作中属上乘之作。

《集纳》在1941年7—8月压缩版面，改为每周一、四、日刊发。至同年9月，恢复每天刊发，但《集纳文艺》和《集纳笔谈》同时取消。此后的《集纳》除开始向职业界征文，刊载职业界黑幕，诉说职工苦闷外，张氏开始了几乎每天一篇的时评，范围针对各种孤岛丑恶人事，对汪伪攻击不遗余力。尤其在孤岛低气压的环境中，特别强调“义民精神”，希以此激发市民气节。但到了9月24日，张若谷突遭法租界巡捕和日本宪兵逮捕，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获释。少了张若谷的编辑，此后的《集纳》失色不少，杂感和时评消失，后继编者无奈将其改为纯文艺副刊，靠前期征文所得的职业经验类文字勉强维持。总体看第三年的《集纳》的表现，基本上如编者张若谷所言：“恢复从前倡导过的新闻小说，并增刊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二种新的资料，取材方面，仍贯彻固有的作风，不过除了揭破社会黑幕，挞伐文化败类以外，还要广载表扬抗建忠勇故事，和歌颂光明自由的文艺作品。”^[43]

纵观三年又一个月的《集纳》，最大的特色即学术性，这在第一年中最为鲜明，此后学术性文章也时有出现，即便到了1941年3月，张若谷还贡献了《三十年来的报纸副刊》。与学术性同样突出的是杂文，明快、质直为其追求。为区别孤岛乃至全国报刊上最为普遍的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等文字，张若谷特别提倡新闻文艺，新闻小说一时还颇为抢眼。《集纳》的战地通讯等栏目，其撰稿人不乏亲身参加游击战的文艺青年，他们贡献的文章在纪实性方面比其它副刊更胜一筹。此外，《集纳》中戏剧翻译如《成吉思汗》《弃簪从戎》等也颇有可观，尤其是前者的翻译，成为日后跨文化译介研究的经典文本。但也应注意，张若谷本人所归纳的“三次蜕变”并非截然分明，这当然也是考虑到让副刊自然接续，不因改版而风格突兀。总之，《集纳》确因在孤岛大型报纸副刊中存续最长、编辑最为稳定、内容和文类特色最为鲜明、地方色彩浓重，战斗姿态最为激进而无愧其党报地位。正如时人所评价的

那样，“中美日报的《集纳》是孤岛最富血性的综合副刊”^[44]。

三 《集纳》的供稿阵容和文化组织

有着党报地位的《中美日报》是国民党政府进行孤岛舆论控制与争夺的“喉舌”，张若谷对此有着高度的自觉。正因此，《集纳》对其供稿队伍也有着近乎苛刻的甄别。与沪上名编辑柯灵组稿《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那种广纳孤岛爱国文化人的方式不同，张若谷的供稿队伍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编者在上世纪30年代从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同道，如朱应鹏、徐蔚南、傅彦长、狄阳冰、黄震遐等；二是因徐蔚南任职的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博物馆，围绕这两个学术机构而拥有了叶楚傖、柳亚子、胡朴安、胡寄尘、胡惠生、胡道静、胡传厚、席涤尘等；三是张若谷的新闻界友人，如胡良成、郎静山、火雪明、杨彦歧等；四是邵洵美及其周边文友，如徐訏、徐迟、温肇桐、老舍、郭沫若、王平陵、曾迭等；五是张若谷的天主教会或震旦师友，如于右任、马相伯、徐蔚南、张元济、于斌、方豪、景培元、牛若望等；六是沪上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如洪洁求、吴山青、吕绍虞、朱海万、喻友信等。最后是投稿青年，包括部分具有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文学青年，如胡野吟、钱今昔、林祝敌、欧阳斌、可亭、张叶舟等。在这些撰稿人中，徐蔚南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一方面联系着柳亚子、胡朴安、胡寄尘、胡道静等新南社社员，同时因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在沪的党报社论委员会即正论社副社长，联系着国民党中宣部驻沪专员冯有真。孤岛报纸的社论很大程度上由他负责，徐氏曾不无夸耀地说，正论社覆盖了“当时除奸伪之报纸外，报纸上十分之四五”^[45]。此外，朱应鹏也不容忽视。朱氏长期服务于《申报》《时报》《时事新报》，在上海艺术大学、复旦大学也有教职，还担任上海党务系统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文艺科长，浸染在政学报界。在《集纳》中，他贡献的文章虽仅18篇，但分量不轻。除少量画论外，多站在国民党立场对重要时政新闻进行述评，一正视听，二督促引导。朱应鹏之外，邵洵美也为《集纳》贡献了31篇诗话和10篇访谈文章。

而张若谷作为编者，在《集纳》撰文千篇以上，功居首位。以上诸人，构成《集纳》中最核心的撰稿人。

当然，仅靠核心撰稿人尚难以支撑全部版面，尤其在第一年中后期，邵洵美、徐訏、徐蔚南等中止供稿，此后需补充新人并在读者中培植作者。事实上，从《集纳》创刊不久，编者张若谷便组织了“文艺写作特辑”进行号召，核心观点即伟大作品的产生需要伟大的时代，在当前民族觉醒的大时代中，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46]。这不啻是一剂对广大文学青年鼓舞激励的强心针。《集纳》除征集“特稿”外，又组织新闻小说的讨论，写作者也持续增加，这说明《集纳》的征文和专题讨论效果明显。另一部分青年作者如可亭、王自强等，从《集纳》创刊就以写作白话诗崭露头角，此后诗歌作者大量开始涌现并占据可观的版面。大约至1939年中，《集纳》的一批青年写作者形成，包括了可亭、王自强、张叶舟（沙羽）、欧阳棣、钱今昔、林祝敌、祝庆年、陶冶、陶铸、高洁、复生、专厂、野吟、岂凡、公怀、夏山奴、木贞、天风、王南走、傅勤家、华榴、费含章、沈知文、疯子、季润模、罗曼、忍之、韦华、信徒、铁郎、祝恬、冰骞、久骏、迺客、过客、吉民、王湧祥、差半、慕杰、巨浪、葛正慧、支韵琮等数十人。这部分作者的写作范围和题材有扩大和深化的趋势，不少人兼擅诗歌、杂文、时评、剧评、史传文、文艺理论和新闻速写。其后张若谷策划了各式专刊、特辑和征文活动，如教师节专刊、淞沪抗战七周年特辑、民族复兴耶稣圣诞节特辑、马相伯先生百岁大寿专页、追悼马相伯先生特辑、上海内幕集体报告征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纪念儿童节、青年节征文、五九国耻纪念、反色情文化特辑、两周年征文、新年征文、妇女节专页、谢晋元殉难特辑等一系列提高与刊物粘合度的编辑措施，尤其在1941年初开始筹措的集纳笔会和3月的“每月佳作竞赛”，很大程度上完成了编者、作者与读者间的紧密联系。

《集纳》的供稿队伍虽然庞大，但若考察孤岛各大副刊的作者群，竟会发现这个群体不但严格区分于左翼的《译报》《华美周刊》《上海周报》，抗战阵营偏中间立场的《申报》《华美晨报》《大美报》，甚至也不同于国民党的另一份党报《正言报》，几乎带有同人性质，这无疑是《中美日报》

文化动员与组织的结果。在整个孤岛时期，该报依托其特殊的党报地位，开展寒衣捐、难民捐、重庆被炸同胞捐、购机捐等献金活动，通过为国纾难的义举让孤岛市民与重庆国民政府相联系。通过签名慰问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孤岛数万市民手书的卷轴邮寄伦敦，通过号召市民捐款苏联侨民协会，声援其抗击法西斯的不屈精神，表现出了另一种“孤岛不孤”的精神。《中美日报》还成立读者通讯研究会，分社会服务部和实用新闻研究部。社会服务部包括了读者职业指导委员会和升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了推荐青年就业，救助贫寒失学青年，提供奖贷学金和保送学生升学。实用新闻研究部包括了新闻组、评论组和副刊组，指导采编新闻，撰写社论专论和新闻文艺的写作等。此外，副刊《艺林》单独成立戏剧研究会，讲授课程，评论电影和戏剧。当然，副刊《集纳》的组织形式、各种征文活动应视为《中美日报》的文化组织的有机部分，故不能将之简单视为文艺性副刊，它实负有组织领导抗战文艺，与日伪斗争并教育引导孤岛民众的重要使命。

四 《集纳》与孤岛文艺抗战的“领导权”问题

在上海孤岛，租界的存在让抗战得以另一种形式继续。1939年5月前，孤岛抗战阵营“洋旗报”达十四种之多，壮大的阵营随即带来同业竞争的加剧。更严峻的是各报新闻来源普遍受限，多数报纸有“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倾向^[47]。出于商业竞争考虑，各报在副刊上下足了功夫，有的竟多达十多个副刊，举凡青年、学生、教育、职业、医药、法律、文艺、思想、游艺、戏剧、电影不一而足，其中文艺副刊特别受到重视，柯灵编辑的《文汇报·世纪风》、王任叔和阿英先后主编的《译报·大家谈》、恽逸群编辑的《大美报·早茶》等都脍炙人口。问题是，不少副刊的论述往往“以极端之议论出之”，阿英、王任叔、唐弢、周黎庵、孔另境等莫不如此。左翼目之为的“内部斗争”，《集纳》则将之视为“放暗箭”。而自居正统的国民党也常常“伐剔异党”，张若谷就发长文批判《社会日报》陈灵犀，长篇累牍抨击王任叔等，更不必说对皖南事变质疑之声的

斥责了。客观而言，孤岛上的诸多辩驳论争背后是精神气质、文化立场、政治观念、派别群体的分野，但容易忽视的是抗战阵营内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的“焦虑”，这在赛珍珠小说《爱国者》的翻译分歧上有集中呈现。此外，“领导方式”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左翼不但讥讽张若谷为“党官”，且抱怨沪上所谓“老作家”的“蛰伏”和“消极”，《集纳》反过来攻击左翼为“横暴”，故左右双方在领导方式上都难言妥当，这从双方刊物供稿队伍的“年轻化”特点上亦可印证。

从充分领导或效果上看，孤岛之所谓“领导权”实不能与重庆文协之“领导权”相提并论，但是否就因此避谈孤岛文艺抗战的“领导权”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一种可能的路径是考察刊物的影响，即从存续时间、发行量、动员组织和开展活动等所谓“影响因子”上下功夫。这样不少言之凿凿“影响巨大”的定期刊物因其旋生旋灭、发行量严重不足的特点被放弃，《中美日报·集纳》则因存期长、发行量大、版面稳定、地方色彩浓重、态度激烈、有效发动文艺抗战和对孤岛人文生态的多样表达被纳入视野，尤其是在1939年5月《文汇报》《每日译报》等被迫停刊，孤岛大型报纸副刊所剩无几的情况下，《集纳》更有其特殊的存在意义。

在孤岛抗战文学版图上，按政治群体来划分大致有左右两个系统。王任叔、梅益、戴平万等参编的《每日译报》《上海周报》《学习》等是左派代表；国民党方面再分为《中美日报》和《正言报》两个系统：前者属中宣部，后者属三青团。《正言报》因创刊在1940年9月的孤岛中后期，影响难与《中美日报》相抗，正如阿英所言，“在今日上海的新闻界，《中美》是应该处于领导的地位的”^[48]，而其最核心的文艺副刊《集纳》实可看做国民党孤岛抗战文艺开展的最重要阵地，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的张若谷^[49]主持《集纳》的过程，也应视为国民党在孤岛发动抗战文艺的全过程。在其中，国民党的抗战理念、文化政策、政治立场得到充分展开。概言之特点如下，一是高度重视民族气节的阐扬和人格的培育，从发掘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前朝遗民义民和当代抗战殉国的烈士三个方面入手，弘扬民族精神和国民意识，希望在孤岛危

机中培育健全国民尤其是青年的人格，以达“挽救人心”之目的。这其中，天主教雷鸣远、马相伯等社会贤达在战时的爱国护教行为和民族献身精神得到特别阐扬。二是体现正统，一方面攻击日汪，另一方面伐剔异党，不时将副刊变为政党斗争的工具。三是突出纪实色彩，将地下战斗人员的经历敷衍成文，希望激励孤岛青年“养成奋发蓬勃之朝气”，“改正醉生梦死之生活”。虽然张若谷事实上承担领导孤岛抗战文艺的重要使命，但这一史实却从未被海峡两岸抗战史研究者所发掘。但若进入具体历史语境，便会发现张若谷实为孤岛抗战冲锋在前的文化人之一，这一点毫不亚于王任叔、柯灵。坦率地讲，张若谷不是一个思想家，但却是一个合格的战时报人，他没有左翼文人对当局强烈的疏离感和反抗气质，相反，是一个伴随1927年国民政府的建立而热情拥抱了民族主义的报人。

[1] 孔另境：《记“廖化时代”的王任叔》，《上海文化》第1卷8期，1946年9月1日。

[2] 国民党战后表彰十三名上海沦陷时期的报人，其中包括柯灵，但需要说明的是，柯灵战时政治身份是东南战区宣传员，见《申报》（上海版），1946年5月14日第4版。

[3] 陈青生：《树立国家主体理念改进抗战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4期。

[4] 冯有真：《抗战以来之上海新闻事业》，《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2年第1期。

[5] 国民党对于上海租界内洋旗报的资金支持部分采取一次性注资，相当于启动经费，若日后经营不善，又无新资金注入，则闭馆，如江苏省政府资助开办的《华报》初有五万元开办费，前后维持8个月后关闭。见《从奋斗到胜利》中《华报》的介绍。

[6] 胡传厚：《悼一位刚毅的报人钱纳水先生》，《中央日报》，1973年7月30日。

[7] 《华美晨报》与《大美报》曾因新闻标题与日伪报纸相似，立场不明，大打笔战。

[8] [13] 胡传厚：《中美日报》，收入《从奋斗到胜利》，中国文化服务社安徽分社1943年7月。

[9] [24] 摩矩：《一年来的总账——战时报纸的责任》，《中美日报》，1940年12月31日。

[10]《中美日报的诞生》，收入《中美日报苦斗记》，第2页，无出版者，1940年12月。

[11]正论社1938年夏在沪秘密成立，胡朴安和徐蔚南任正副社长，属国民党中宣部，主要集合在沪知名文教界人士，撰写社论供给在沪各大报刊，参加人员有李秋生、倪文宙、詹文浒、吴国隽、袁业裕、陶樾、查修等，出版有《正论》两日刊，仅存1938年6月10日第6期，6月25日第9期。

[12]《伪上海宪兵沪西队密侦队呈文》，收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第6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中美日报》的三次停刊的具体时间段为1939年5月19日—6月1日，1939年9月18日—10月8日，1940年2月1日—2月13日。袁义勤在《中美日报始末》中误将首次停刊时间认为从5月10日始，为期三周，实为5月19—6月1日，为期两周。

[15]《申报》（上海版），1937年3月14日。

[16][34]欧阳棣：《论副刊的性质》，《中美日报》，1939年11月16日第8版，此后注释《中美日报》若不标出版面，均为第8版。

[17]张若谷：《三十年来的报纸副刊—抗建时期中的副刊》，《中美日报》，1941年3月27日。

[18][21]张摩矩：《文学家与新闻记者——集纳创刊前奏》，《中美日报》，1938年11月1日。

[19]摩矩：《集纳选集·编者小言》，《中美日报》，1940年6月1日。

[20][43]摩矩：《为集纳革新告读者》，《中美日报》，1941年2月12日。

[22]张若谷：《什么是新闻文艺》，收入《新闻学的基础知识》（无连续页码），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无出版时间）。

[23]《中美日报》，1941年3月30日。

[25]摩矩：《过去与今后的集纳》，《中美日报》，1939年12月31日。

[26]沙羽即张叶舟，见《驳斥与敬告》，《中美日报》1940年11月29日。另据蒋锡金《关于文艺新潮及其他》中对张叶舟的记述，张叶舟孤岛时期参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由此判断沙羽在《战地情报》中的文章是张叶舟参加游击战斗的亲身经历。

[27]志明：《高鹏》，《中美日报》，1940年1月19日。

[28]志明：《牛廷陞》，《中美日报》，1940年1月25日。

[29]《中美日报》，1939年8月30日。

[30]华西擎：《讽刺杂文》，《中美日报》，1938年10月13日。

[31]杨晋豪资料参见拙作《现代文学史上的杨晋豪》，《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

[32]老张：《杂文的社会价值》，《中美日报》，1939年11月2日。

[33]张若谷：《鲁迅的华盖集》，《新时代》1卷2期，1931年9月。

[35]张若谷：《十五年写作经验》，第9页，谷峰出版社1940年版。

[36]欧阳棣：《谈绕笔头》，《中美日报》，1938年12月13日。

[37]摩矩：《回顾与展望集纳二周年纪念》，《中美日报》，1940年11月1日。

[38]《中美日报》，1940年11月3日。

[39]上海社科院编《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中列出前25期编目，少7期。

[40]摩矩：《集纳又一新贡献 集纳笔会征求会友》，《中美日报》，1941年1月1日。

[41]《集纳笔会成立宣言》，《中美日报》，1941年2月5日。

[42]《正气楼随笔》中有悼念费震青的文章，作者摘奸称之为先舅。据张若谷后人称，费震青系张若谷夫人费志仁父亲，故可推断摘奸即张若谷本人。

[44]浙沥：《上海报纸副刊述评》，《新闻学报》第2期，1940年4月24日。

[45]徐蔚南讲，易忠恕记录：《中国新闻事业》，《工作》复刊第3期，1946年9月。

[46]恒如：《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中美日报》，1938年11月20日。

[47]孤岛报纸的同质化倾向，在《大英夜报》《每日译报》的副刊《新闻学》中有部分讨论，如君宜（恽逸群）的《上海报纸应当发展之路》，见1939年3月2日《每日译报》第4版。

[48]魏如晦：《大家要从大处着想》（一），《社会日报》，1940年12月10日第2版。

[49]邓牛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索考》，《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